

晏陽初文集

四川教育出版社



晏阳初文集

晏阳初著 詹一之编

四川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屏汉

封面设计：何一兵

版面设计：刘 江

晏阳初文集

詹一之 编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75 插页11 字数310千

1990年3月第一版

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册

ISBN7-5408-1242-7/G·1208 精装 定价：8.50元



1985年9月21日，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在中南海会见晏阳初博士。邓颖超同志说，“欢迎！欢迎！多年不见，非常想念，我们是老朋友了。恩来同志在世时常向我提起你，你一生从事平民教育，矢志不移，对中国和世界做出了贡献。”



1988年10月26日，晏阳初博士九秩晋五大寿。

代序

坚持为农民服务的思想，努力建设 现代化新农村※

——晏阳初先生创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简略回顾

詹一之 陶维全

不久前，在北碚举行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校史研究会理事（扩大）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建立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从事科研、教育和社会实验三位一体的研究机构的初步方案。这件事是去年9月，原乡村建设学院院长晏阳初先生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谷城邀请回国考察期间，由乡建学院重庆校友在成都的欢迎会上提出的。晏老听到这一倡议后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愿意大力支持和合作。他回美国后，对这项工作一直十分关注，并委托华西医科大学陈志潜教授与校史研究会、重庆有关部门商讨，经过多次研究，共同拟定了一个由重庆社会科学院

※ 1950年12月，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反动组织，所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也被军事接管。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少校友曾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校史研究会”于1986年4月18日为此向中共重庆市委写了专题报告，请求对这一事件进行复查。在1986年7月11日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会议上，审查了校史研究会的这一报告，并研究决定以在《重庆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方式，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平反，恢复名誉。

与晏先生任董事长的国际乡村建设学院合作，建立这项研究中心的初步方案。在理事（扩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80多位乡建学院校友中，有七八十高龄的原学院的老教授，活动在各条战线的专家、学者、党政干部，还有专程从美国赶来的校友。大家欢聚一堂，怀着对学院生活的美好记忆，本着晏院长昔日教导的为乡村建设服务，为老张、老王（即贫苦农民）服务的思想，从我国今天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对提出的初步方案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并一致表示愿意尽力支持和促进这个研究中心早日建立。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它既体现了年近百岁、身居海外的晏老依然恋恋不忘为中国农民服务、为中国乡村建设作贡献的真诚愿望；同时也是我国今天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

晏阳初博士从20年代起就在中国倡导平民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元老之一，是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1943年，他在纽约纪念哥白尼地动说400周年纪念大会上，被国际学术界选为与爱因斯坦等并列的“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由于晏先生从1950年起就一直居住海外，而今在我国知识界40岁以下的人中，他的事业已很少为人知晓了。加之，1950年底重庆市军事管制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晏先生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和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曾受到不公正的处理，被视为反动组织和进行“奴化”教育的反动学校，因而被接管；当时的代理院长魏永清教授被定为反革命。原乡建学院不少师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不同程度地受到株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改判，已“宣告魏永清无罪”。但是，

上述对“平教会”和乡建学院的不公正结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在过去出版的一些教育年鉴和教育史著作中，以当时重庆市军管会曾公开宣布接管的结论为依据进行批判，形诸文字，广为流传。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晏先生倡导的平民教育和他所创办的乡建学院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和公正的评价。

晏阳初先生系四川巴中县人，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1918年，晏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即与当时留学海外的百多名中国学生一起，应募到法国为华工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近20万华工在法国战场上当“苦力”）。晏身为博士，他从代华工读写家书开始，到创办识字班，帮助他们识字。华工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和互帮互教精神，使晏深受感动，便下定决心，立下了回国后不做官、不发财、不为上层士大夫效力，一心为最贫穷的文盲同胞服务的志向。晏先生1920年回国后，先在北京发起组织大众教育联合会，1922年又在长沙兴办平民学校，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当时毛泽东同志对此曾表示热情支持并应聘为平民学校教师）。1923年，晏在北京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先后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扫盲活动。1926年起，他又团结和率领一批有志乡村建设的高级知识分子，深入到河北定县推行平民教育，开展“实验县”工作，历时11年。晏先生本着“与平民打成一片”，“解除苦力之苦，开发苦力之力”的宗旨，提出以“文化、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医治农民中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弊病。他领导的“平教会”在定县进行了一系列改良和革新的试验工作，为人民做了大量

好事。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博士下乡”。1928年晏应邀赴美讲学，并接受耶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经过十个月的奔走呼号，募捐得到50万美元。翌年回国，聘请了几十位专家到各地乡村工作，先后在湖南、贵州和四川办起“实验县”。

1940年，“平教会”搬迁到四川北碚歇马场。在无比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致力于培养乡村建设人才。正如晏老去年回国考察时在北京校友举办的欢迎会上说的：“回想当时1940年办乡建学院时真是苦极了。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中国，控制亚洲。国家要灭亡时，我们就是要坚持抗战。我们是在枪林弹雨中办起了乡建学院的。当时爱国青年不去城市，而来乡建学院学习，深入农村，研究问题，认识问题，协助农民解决问题，使农民能够自力更生。”这也正是晏老当年办乡建学院的宗旨。办学经费全靠他沿门托钵，以从事乡村建设的实绩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支持关注而解囊相助。他在美国募得的巨款，从不为个人和家属子女谋私利，而是全部用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当时还在巴县、璧山、北碚等地开办了实验区，为当地群众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晏老办学的方针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为学院培育和树立了民主进步、团结互助、勤学奋发、艰苦朴素的好校风。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环境下，他常说，要保持乡建学院这片“干净土”，这块“民主自由园地”。为此，他不惜承受种种风险，顶住强大压力，他抵制了国民党在大学设立训导处的规定。为了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让学生成立“四自会”（自治、自习、自给、自强），每学年由全院学生民主普选产生，并赋予它很大的权力。他提倡学术自由，允许学生自由出壁报，组织

社团，举办学术讲座，各种研究会和讲演会、讨论会等。他抵制、取消了国民党规定的“三民主义”必修课，并且宣布党、团退出学校，不许国民党、三青团在校内设立党、团部。学校聘请的主要教授大都是进步的，并允许他们开设和讲授新经济学、新哲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晏先生支持师生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在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中，他不仅支持师生去重庆市区参加示威游行，在学生遭受特务毒打后，又亲自进行慰问，并公开声明要给美国总统杜鲁门拍电报，要求制止美军在中国的暴行。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他称赞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对进步师生多方表示关切和爱护。从1940年乡建学院建立之日起，直到重庆解放，学院里一直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支部存在。由于党组织不断开展工作，师生中的进步力量大，也比较团结，因而在重庆地区的历次学生运动中，乡建学院师生都是一支站在斗争前列的重要力量。1947年“六一”事件中，学院被捕入狱的师生达31人，将近占全院师生的百分之十。晏老对此痛心疾首，并积极进行营救。重庆一解放，乡建学院就一批又一批地为地方和军队输送干部，得到北碚区、重庆市党政部门充分肯定并给予高度评价。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同晏老院长当年坚持把乡建学院办成民主、自由园地的方针分不开的。正因如此，去年9月邓颖超同志会见晏老时，称赞他解放前在国内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不少人才；他的学生有些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①。我们认为对晏老的这个评价，他是受之无愧的。

^①参见1985年9月21日《人民日报》《邓颖超会见晏阳初博士》。

1950年以后，晏老受聘担任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一直住在美国，继续致力于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1951年，他建立了国际农村建设委员会，提出了“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的口号，向国际社会发出“帮助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消除贫穷、文盲和愚昧”的呼吁。1967年5月，晏老在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建设学院”，为菲律宾和亚、非、拉几十个国家培训乡村建设人才。同时，还帮助印度、泰国、加纳及一些中美、南美国家建立了乡村教育组织。

30多年来，晏老虽然身居国外，但正如他常说的，他的主张、理想、作风都是中国的，搞的是国际平民教育，而心仍在中国。去年回国前夕，他还对周围的人说：“我已到了这般年纪了，有责任有义务回去好好看看，考虑余年为祖国做什么事情。”正是在这颗光采照人的爱国丹心的驱策下，他在接到邀请后，毅然以92岁的高龄，不辞万里旅程的辛劳，远涉重洋，回到祖国，在北京、河北、四川进行了参观考察，晏老从来都不是一个满足于已有成就而故步自封的人。他在87岁时，犹手书了“不持成见，当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警句，作为他的“九大信条”之一。晏老一生的实践也证明，他确实是一位为平民教育事业奋斗了一辈子，又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学者和实干家。他去年回国，在成都的欢迎会上深情地说：是“全国的四化建设和巨大的变化感动了我，我是真诚地回来学习的。观察研究以后，不是‘朝闻道，夕死可矣’，而是朝闻道就要传道，要朝夕传道，而且要大干。我言必行，行必果，不过要给我时间研究，精细地研究，还是我们60

年来的作风，是一个研究生、学生的作风。”在去年回国考察中，他对我国乡村建设的成就不仅感到“特别兴奋”、“非常激动”，对我国现行农村政策十分赞赏，说他“看到了中国的无限前途和希望”，说“邓小平先生是扭转乾坤的人物，我佩服他得很”。他联系自己60多年在国内外从事乡村建设的经验，深刻地讲到：“中国农村建设工作做得实在是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只不过是一种方法的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这些制度”。他又讲：

“中国的乡村建设经验对第三世界很有启发，我要把它带回去虚心研究、推广，就是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晏老的这些话是多么真切感人啊！这是出自一位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从事乡村建设60多年而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又目睹了92年中国和世界史变迁的老人的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这里不但饱含着晏老对祖国的无比深厚的感情，而且也生动地体现了他对事业的科学态度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的精神。

晏老去年回国考察时，还多次讲到，他回来既是为了学习，又是为了“考虑余年为祖国做点什么事情”，“为增进大陆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友谊，为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农村的改革，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重庆社科院与国际乡村建设学院将联合组建的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就是晏老在这方面“言必行，行必果”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作为原乡建学院的学生，将尽力地促进这个研究中心的早日建成。

最后，我们想引用列宁在有名的《论合作制》中的几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列宁写道：“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含有很多幻想。他们……不懂得工人阶级为推翻剥削者的统

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根本意义。现在，我国已经推翻了剥削者的统治，因此，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甚至是浪漫的或庸俗的东西，已经成为毫无粉饰的现实”。因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已经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国家机关，……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的基地上站稳了。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①。由此可见，列宁在《论合作制》即他最后的“政治遗嘱”中，把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不仅希望全体校友，也欢迎在我国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志于为农民服务、为乡村建设出力的青年同志和朋友们，都来关心、支持和参予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的工作。让我们共同在党的领导下，为我国农村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同时，积极与晏老合作，也将为第三世界国家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贡献！

^①《列宁全集》第33卷第422、429页。

前言

《晏阳初研究会》于1989年3月在四川师范大学成立。它的宗旨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晏阳初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思想与实践进行研究、介绍，并从我国当前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出发，组织实验推广，为我国乡村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研究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辑出版《晏阳初文集》。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对晏阳初平民教育、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研究。

晏阳初是世界著名的平民教育家，其思想与实践极富有研究价值。他在美国留学时就立下志愿：回到祖国，不发财，不做官，不为文人学士效力，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1920年回国后，他以惊人的毅力、全心全意地从事平民教育、乡村建设。从50年代起，他居住在海外，积极推行国际平民教育运动，协助第三世界国家和落后地区进行乡村改造和建设工作。而今，这位百岁老人仍然在“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不息。

1988年4月，他在菲律宾召开的国际乡村改造研讨会上，和中国代表谈话时，还满怀激情、至为感人地溯述了他献身平民教育事业的艰苦历程：“靠沿门托钵，穷干、苦干、硬干了70年，从在中国干到在世界上干。”“70年来，我最大的发现是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平时人们只想到开发金矿，煤矿，这矿那矿，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开发‘脑矿’。充分发掘10亿中国人民无尽智慧和潜在力，就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他还特别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一定要消灭两种瞎子：一种是文盲，这是无教的结果；一种是民盲，就是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嘛。我几十年前倡导平民教育，目的就在于唤起民众。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超越其民众而强盛起来的。”“全球三分之二的人都陷于苦力阶级”，“只有这许多大众——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开发的资源，经过教育而发展，且受教育而参加他们自己的建设工作，才有着普遍而持久的世界和平。”“我相信：世界需要这一为世界民主、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教育。70年来我一直在干这件事，今天还要把它继续干下去！”

建国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段时期里，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晏阳初当年在国内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实验，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科学评价，反而被加诸以种种莫须有的政治罪名。但是，在海外他的光辉思想和感人事绩，却一直受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广大有识之士的推崇和赞扬。1943年在纽约举行的哥白尼逝世40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与爱因斯坦、杜威等被国际学术界选举为“全球十位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伟人”之一。从1950年起，他长期担任国际平民教育促进

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1983年他90寿辰时：美国各界颁赠予艾森豪奖章；美国大通银行总裁大卫·洛克斐勒邀请了美国国家代表、政界要人、银行企业家、著名学者150余人在联合国代表团餐厅为他庆生，在庆生邀请函中特别写道“晏老对人类的贡献乃是最高层次的”。1987年10月，他被请到白宫，接受里根总统颁赠的“扫除饥饿总统奖”的终身成就奖。……

晏阳初有一颗赤忱的爱国心，他虽身居海外，却时时思念祖国，常说：“我的主张、理想、作风都是中国的；干的是国际平民教育，而心仍在中国。”他于1985年、1987年带着“我已到了这般年纪了，有责任有义务回去好好看看，考虑余年为祖国做点什么事情”的意愿回国考察参观。邓颖超会见时称他：“一生从事平民教育，矢志不移，对中国和世界作出了贡献。”万里同志会见他说：“这些年，我们重点是先把农村的经济搞上去，随之农民的教育和文化也需要跟上去。你在农村做了那么多年教育和改造工作，既有国内经验，又有国际经验，我们对你抱有希望，希望你多做贡献。”

作为编辑出版这本文集的前言，下边我想简略地谈谈对晏老从事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的认识，以及它对我们今天农村改革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对晏老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的认识

晏老是一位教育家，是首创平民教育运动的教育家，这是世界公认的。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教育家，实际上已突破和超

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教育家的范畴，而是一位社会改造运动的实验家和实践家。这是他从平民教育发展到了以定县实验为标志的乡村改造和建设而开始的。定县实验也是他的思想形成和成熟的阶段。定县实验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概括起来说，就是以扫除文盲、办平民学校为基础、为第一步的工作，在此基础上采用三大方式、推行四大教育，以达到对乡村的整体改造和建设。它的两个基本点是：

（一）对社会进行整体改造的思想。所谓三大方式即学校教育、社会式教育和家庭式教育，指的是教育的方式、组织形式。也就是说，是以全社会为覆盖面的。所谓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健康教育和公民教育，这是从教育内容上讲的。也就是说，要从整个乡村社会所存在的各项重大问题出发，进行综合治理、整体改造和建设。既不是只看到或强调某一项问题，比如经济、或者教育，而忽视其它，也不是把相关的各项问题孤立起来，零散地、各顾各地去解决，而是强调四大教育相互扣合、结成一体、相辅相成、联环进行，从而达到对社会的整体改造和建设，以取得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和健康发展的效果。这种对社会进行整体改造和建设的思想和方法，是从定县实验中总结出来的，我认为，也是很光辉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列宁讲的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的思想，与后来出现的系统论以及今天西方提出的综合国力论的思想，应该说都是很接近或较吻合的。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中国条件下，能够明确地总结和提出这样的科学思想，并用以指导乡村改造和建设，更是难能可贵的。

（二）把“人”看作是根本的思想。所谓三大方式、四大